

河西公与莫高窟

李茹

(敦煌研究院, 甘肃 敦煌 736200)

[摘要]北周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域诸国之间推行友好往来的对外政策,使得当时的丝绸之路进一步通达无阻,丝路重镇敦煌重现光彩,成为宇文氏王朝的西部重镇。因而,北周很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令狐整、令狐休、韦瑱、段永、李贤、于义等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敦煌佛教的兴盛与李贤、于义有密切关系。笔者以北周历任瓜州刺史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为视角,探讨了河西公李贤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并对其与敦煌李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河西公李贤;敦煌莫高窟;佛教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4-0009-05

557年,宇文觉立北周,与高洋北齐对垒。北周王朝(557~581)在中国中古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25年,但是,隋统一中国,正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与关陇以西的西魏、北周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方面的措施有关。北周政权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军事上创立府兵制,政治上建六官组织关陇集团。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北周社会基础得到稳固和加强,后来,北周灭北齐,继而隋文帝杨坚又凭借这一基础灭陈,从而一统南北。

关于北周政权的对外政策,《周书·异域传上·序》载:“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虽东略漏三吴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国威之。”北周时期的敦煌,对外关系相对安定。它与北面的突厥实行联姻,在西魏、北周时就世代结亲,基本上相安无事。对于敦煌南北的吐谷浑,北周联合突厥予以压制,致使吐谷浑“保定中,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此外,还有高昌、粟特、波斯等国都遣使“献方物”,百济、安息也曾遣使向北周朝廷“献方物”。

北周与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及其西域诸国之间推行友好往来的对外政策,使得此时的丝绸之路进一步通达无阻,丝路重镇敦煌重现光彩,成为宇文氏王朝的西部重镇。据文献记载,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段永、河西公李贤、建平公于义先后任瓜州刺史。在20多年中,虽然经历了周武帝灭佛之灾,但远在中国西部边陲的敦煌并未受到重大影响。敦煌文献所出北周写经有明确纪年的大多集中于保定元年至天和四年(561~570),可以推测周

武帝废佛之前敦煌佛教盛行。在此期间,莫高窟共建洞窟15个。而此期间任瓜州刺史者正是河西公李贤与建平公于义,敦煌佛教盛世的到来当与李贤与于义有密切关系。

一、北朝瓜州刺史与莫高窟的营建

众所周知,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圣历碑》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莫高窟现存十六国晚期的洞窟七个,虽然现已无从考证乐僔、法良窟究竟是哪一个,但充分表明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是以禅僧为主的。

武周圣历碑还记载了继乐僔、法良之后的莫高窟建窟情况:“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表明从北朝开始,中原王朝派皇室成员长期镇守敦煌,碑文中提到的东阳王就是在莫高窟开创建窟风气的北魏宗室元荣。

自北魏明帝孝昌元年(525),北魏帝室东阳王元荣西刺瓜州以来,至578年建平公于义结束瓜州刺史任的这53年间,北朝政府曾派12人先后西刺瓜州,可见北朝十分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而这些西刺瓜州者不乏贵族名门之后,其中东阳王元荣、元荣之子元康、令狐整、令狐休、韦瑱、段永、李贤、于义等显赫人物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他们大多笃信佛教,莫高窟佛事活动在这时的兴盛与大规模营建与他们不无关系。

元荣(?~545),又名元太荣,北魏宗室,曾在敦煌担任瓜州刺史,封东阳王,统治瓜州时间为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25~545)。《魏书》、《周书》中称元太荣,而在敦煌文献中则时作元荣,时作元太荣。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元荣以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出任瓜州刺史,因官寓家于敦煌。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元荣被加封为东阳王。当时,中原内地发生了贵族叛乱与各地起义,形势非常混乱。元荣远官西部边陲敦煌,他既是作为一地之主的瓜州刺史,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希望籍由奉佛来保持当地民众的平安。他请人抄写了大量佛经,并在莫高窟主持营造了一个大窟。

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大般涅槃经》卷30(尾题)(S.4415)记载:“大代大魏永熙二年(533)七月十五日,清信士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敬造涅槃、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总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仰为比(毗)沙门天王,愿弟子前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所是。”说明在北魏永熙二年(533)之时,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就发心抄《大般涅槃经》、《法华经》、《贤愚经》、《观佛三昧》、《金光明》、《维摩诘经》、《药师经》诸经各一部,共100卷。北魏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北魏政权不稳,在这种情形之下,元荣请人抄写大量佛经,显然与当时社会形势和个人忧患息息相关。他希望通过奉佛保家护众、护佑平安。

元荣笃信佛教,除了主持大量抄写经书活动外,在其任职期间,由于热心奉佛,对莫高窟的营造活动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东阳王元荣的研究最早当属宿白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其《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就已考证东阳王功德窟为今莫高窟第285窟,此窟有西魏大统四年(538)的发愿文。窟内造像及壁画人物形象褒衣博带服饰风格,应当是元荣从洛阳带来工匠或粉本后逐渐在敦煌地区流行起来的佛教范式。元荣在瓜州任职近20年,在他倡导下,莫高窟开窟造像之风盛行,他对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元荣在敦煌逝世。元荣故后,敦煌当地大族一致推荐元荣之子元康继任瓜州刺史,但元荣之婿刘彦阴谋篡位,杀死元荣子元康自任瓜州刺史。这在《周书》卷32列传24《申徽传》均有记载:“先是,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遑问罪,因授彦刺史。”

元荣故后,其婿刘彦作乱,这时申徽奉命出使,安抚敦煌,平定了刘彦的叛乱。申徽因为出使有功,使敦煌地

区得到安定,被西魏朝廷提升为都官尚书。在平定刘彦之乱后,大统十二年(546),西魏政府任命成庆为瓜州刺史,可惜成庆还没来得及治理敦煌,就发生了“张保之乱”。

《周书》卷32列传24《申徽传》记载:“十二年,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启请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节、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俭约率下,边人乐而安之。十六年,征兼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另据《周书》卷36列传28《令狐整传》记载:“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本以张保肆逆,毒害无辜,阖州之人,俱陷不义。今者同心戮力,务在除凶,若其自相推荐,复恐效尤致祸。’乃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诏以申徽为刺史。征整赴阙,授寿昌郡守,封襄武县男……太祖谓整曰:卿少怀英略,早建殊勋,今者官位,未足酬赏。方当与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贵。遂立为瓜州义首。”

史书讲的正是当时敦煌的形势,西魏末年河西在各地起义的影响下,凉州刺史宇文仲各据州谋瓜,瓜州城民张保杀刺史成庆自立。此时的敦煌多有乱事,瓜州主簿令狐整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张保之乱”。令狐整赶走张保之后,向西魏朝廷请求派遣刺史管理敦煌。同年,先是由出使波斯使团的张道义代行理瓜州事务,紧接着,由申徽正式继任瓜州刺史。令狐整因为协助申徽,先后平定刘彦、张保叛乱,被西魏政府立为瓜州义首,赐姓宇文氏,名垂青史。

大统十二年至十六年(546~550),申徽任瓜州刺史,历时五年。在他治理敦煌的五年任期内,清廉节俭,深受敦煌民众爱戴,敦煌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

西魏废帝元年至西魏恭帝初(552~554),王子直代理行瓜州事务。《周书》卷39列传31《王子直传》记载:“魏废帝元年(552),拜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静,务以德政化民,西土悦附。魏恭帝初(554),征拜黄门侍郎。”

魏恭帝元年至魏恭帝三年(554~556),河西公李贤继任瓜州刺史。《周书》卷25列传17《李贤传》记载:“魏恭帝元年,进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后以弟子植被诛,贤坐除名。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魏恭帝三年至北周明帝二年(556~558),韦瑱继任瓜州刺史。《周书》卷39列传31《韦瑱传》记载:“魏恭帝二年(555),赐宇文氏。三年(556),除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吏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明帝武成二年至武帝保定二年(560~562),尔绵永(段永)任瓜州刺史。《北史》卷67列传55《段永传》记

载：“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尔绵氏……周孝闵帝践阼，进爵广城郡公。历文、瓜州二州刺史。”据文献记载，继元荣之后，另一位笃信佛教的就是北周时期的瓜州刺史段永。

敦煌文献《维摩诘经义记》卷第4(S·2732)有明确的北周保定二年(562)的尾题：“保定二年(562)壬午于尔绵公斋上榆树下大聽(德)僧雅讲维摩经一遍私记。”据学者考定，“尔绵公”应是北周时瓜州刺史大将军尔绵永，即段永。段永，《北史》卷67列传55有记载：“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尔绵氏。历文、瓜二州刺史，户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将军。永历任内外，所在颇有声称，轻财好士，朝野以此重焉。”作为瓜州刺史的段永，曾修造过尔绵寺，并邀请高僧于府邸讲经，就有可能顺应当时“赖经闻佛，籍像表真”的风气而在莫高窟修龕造像。可以说，瓜州刺史段永与莫高窟北周洞窟的开凿有某种直接的关系，并对当时的开窟造像活动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保定二年至保定四年(562~564)，河西公李贤出任瓜州刺史。《周书》卷25列传17《李贤传》记载：“魏恭帝元年，进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后以弟子植被诛，贤坐除名。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李贤任瓜州刺史期间曾修一洞窟，据笔者推测为今莫高窟北周第290窟。

于义(531~581)，字慈恭，河南洛阳人，北周大臣，曾于564~578年任瓜州刺史，《隋书》、《北史》有传。由于于义以德化人，治理有方，北周朝廷赐封他为建平郡公。于义任瓜州刺史15年，是历任北朝瓜州刺史时间最长的一位。于义任瓜州刺史时，正值北周佛教兴盛。他与前任刺史河西公李贤一样信奉佛教，并在莫高窟开窟造像，弘扬佛法，为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出任刺史期间，曾在莫高窟“修一大窟”，宿白先生《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⑪和施萍婷先生《建平公与莫高窟》^⑫两文考证了建平公西刺瓜州的时间以及建平公与敦煌石窟营造的关系，首次推断莫高窟第428窟可能是建平公所开功德窟，现已被学界所公认。

二、河西公李贤与敦煌

北朝时期先后继任的瓜州刺史，例如东阳王元荣、尔绵公段永、河西公李贤、建平公于义，他们在帝王崇佛的思想影响下，集合当地僧侣集团礼佛修德，开窟造像，建成了莫高窟北朝时期所特有的“王公窟”。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北周瓜州刺史河西公李贤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

李贤(501~569)，字贤和，西魏、北周大臣，《周书》、《北史》有传。周武帝时征拜为大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死后谥桓

公，^⑬时年68岁。

就李贤的名号问题，《周书》、《北史》与《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记载存有异处，现就笔者管见所及，摘录如下，以便互校补阙。

《周书》卷30列传22《于翼传》记载：“尉迟迥举兵也，河西公李贤弟穆为并州总管，亦执迥子送之。”^⑭《周书》卷25列传17《李贤传》记载：“魏恭帝元年(554)，进爵河西郡公。”^⑮《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记载：“恭帝元年(554)，进爵西河郡公。”^⑯李贤墓志题为“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⑰

显然，《北史·李贤传》将“河西郡公”误作为“西河郡公”，“河西”当指北魏大统十二年(546)李贤曾率军打败茹茹(柔然)，抚尉河西五郡的地区之称。另外，因先行的研究者对建平公于义名号的考定并非依据正史而定，而是取莫高窟碑记为主。《周书》卷15列传7《于谨传附子寔传》记载：“翼弟义，上柱国，潼州总管，建平郡公。”^⑱于翼为于谨之弟，于义为于翼之弟。《隋书》之《于义传》记载：“累迁安武太守……进封建平郡公。”^⑲莫高窟发现的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莫高窟修佛龕碑》(下称《圣历碑》)载：“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乐僔、法良发其迹，建平、东阳弘其迹……”据专家考证，莫高窟碑记中的建平公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建平郡公。因此，笔者今从墓志所述，取李贤名号为“河西公”。“河西郡公”抑或是“河西公”，名虽异而实为同一人也。因先行研究者已将“建平郡公”取为“建平公”，而李贤与于义前后相隔两年西刺瓜州，故取“河西公”之说，仅供参酌。

李贤和诸子及弟、侄等官爵，本传记载颇为详细。李贤有李询、李崇等数十子，^⑳有两弟：大弟李远，西魏、北周名臣，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阳平郡公；二弟李穆，西魏、北周、隋三朝元老，官至骠骑大将军，前后被进封武安郡公、申国公。隋朝建国后，李贤被杨坚视为开国功臣，特封为太师。^㉑李贤的侄子——李基在魏恭帝即位之际，进爵敦煌郡公。^㉒

有关河西公李贤事迹的考证，《北史》、《周书》有传，《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与《周书》所载《李贤传》出入不大，较之略有概括之意。此外，主要依据是宁夏固原发现的李贤墓志资料。北周是一个只有25年历史的朝代，李贤又是北朝时期开国元老，他与北周宇文氏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位列公卿。因此，李贤墓的发掘，对北朝文物考古研究具有很大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北周美术史以及莫高窟北周石窟艺术提供了参考资料。1983年9~12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宁夏固原博物馆，联合对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的一座古墓进行了发掘，经发掘清理和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得知，此墓为北周

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葬墓,葬于北周天和四年(569)。²³

本文以《周书·李贤传》与《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反映出的历史信息出发,主要考证了李贤西刺瓜州与敦煌的关系。

《周书·李贤传》载,李贤于魏恭帝元年(554)进爵河西郡公,后因宇文护发动的宫廷政变,受其侄李植牵连,在558年前后被免爵。正史虽无记载李贤在被免爵之前、授爵之后这五年期间是否曾出任过瓜州刺史,但“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显而易见,“复贤官爵”指的是恢复李贤“河西郡公”的爵位,“仍授瓜州刺史”,有可能是李贤在复爵之时再次西刺瓜州。

《李贤传》记载:保定四年(564),北周置河州总管府,李贤任河州刺史;保定五年(565),北周政权废河州总管,置洮州总管府,李贤任洮州刺史。之后不久,“俄废洮州总管,还于河州,置总管府,复以贤为之”。可见,“复以贤为之”明确指的是李贤再次出任河州刺史之事。笔者认为这里的“置总管府,复以贤为之”的“复”与“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的“复”字具有相同意义,也是强调说明李贤再次出任瓜州刺史一事。就这一问题,孙修身先生也认为,“仍授瓜州刺史”云云即证他在保定二年前就已在瓜州任过职了。²⁴另外,张书城先生《〈新唐书〉陇西李氏敦煌房辨疑》一文中也提到“在西魏、北周时李贤、李穆两兄弟曾居官敦煌并居家敦煌,可称为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²⁵由此可见,李氏兄弟西魏时因官寓家于敦煌当是无疑的事实,只不过《周书》和《北史》之《李贤传》均以“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一句话省略而已。

《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附植弟基传》记载:“魏恭帝即位,进爵敦煌郡公。”恭帝元年为公元554年,魏恭帝即位,当指554年。李贤亲侄、其弟李远之子李基授爵“敦煌郡公”。《周书·李贤传》记载:“魏恭帝元年(554)进爵河西郡公。”²⁶“河西郡公”李贤是河西五郡之首,“敦煌郡公”李基仅是敦煌一地之王,而且李氏家族的崛起以李贤、李远兄弟二人功勋为显著,不难发现,李基应是随李贤同赴瓜州而赐封的一个爵位。李贤封爵“河西郡公”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大统十二年(546),李贤随独孤信征凉州,平之。又抚慰张掖等五郡而还”。李贤先后从征凉州,打败茹茹(柔然),抚慰河西五郡,屡建功勋,因而被加授使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成为北周政权西部边陲的守护神,“虏遂震慑,不敢犯塞”,全仗李贤的威名。因此,魏恭帝元年,李贤被封爵河西郡公,管辖河西五郡(今敦煌、武威、张掖、酒泉、金城)。

另据《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记载:“利建茅社,启土于河西,分竹敦煌,仍专万里之务。”“启土于河西”当指

李贤率军打败茹茹,抚慰河西五郡之事,表明李贤对河西的征伐、抚慰是有功的,因此才会“分竹敦煌”,表明李贤西魏时已居官于河西州郡。“仍远专万里”指即使李贤远赴西部边陲,仍然在朝廷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书》、《北史》均记载“保定二年,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史料说明只有“封贤官爵,授瓜州刺史”,才更有可能“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前引资料可以作为推测李贤第一次西刺瓜州的时间在恭帝元年后的一条辅证。论述至此,笔者认为李贤出任瓜州刺史时间可能有两次:第一次,魏恭帝元年至三年(554~556),韦瑱出任瓜州刺史之前,即可能是554年出任瓜州刺史,历时两年;第二次,保定二年至保定四年(562~564),亦历时两年。

三、河西公李贤与莫高窟第290窟的营建

关于莫高窟第290窟的窟主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许多学者作过研究,主要结论有:日本学者小野玄妙为代表,认为是法良禅师所开;²⁷以向达先生为代表,认为是北魏正光年间营建;²⁸常书鸿先生也主张第290窟为北魏窟;²⁹以日本学者福山敏男为代表,认为第290窟是西魏窟之一。³⁰后来,由敦煌研究院专家进一步考证,认为第290窟属北周时期所开,并考定了相对年代,主要代表观点有:樊锦诗先生认为,此窟建于西魏大统十一年至隋开皇四年(545~584),主要在北周时期;³¹李崇峰先生认为,此窟营建于明帝武成二年至武帝建德三年之前(560~574);³²赵青兰女士认为,此窟营建于北周保定三年之后至武帝建德三年之前(563~574)。³³

关于第290窟的建窟上限年代本文采用赵青兰的观点,因为像莫高窟第290窟这样一个中型洞窟,估计建造时间需两年左右。另据马德先生在其著作《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对相关洞窟的营造时间的研究成果可知,如莫高窟第156窟这样的大型洞窟“三载功充”,³⁴这里包括了从开凿到绘塑等全部工程完工的时间。第156窟的绘塑与修建窟檐的时间应该是几个月内就可完成,所以,经推测它的开凿所花时间在两年半左右。³⁵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出第290窟可能性最大的营建年代应在563~564年,约历时两年。又考虑第290窟具有莫高窟其他王公窟的特点:一是规模较大;二是内容丰富、特别,贴近现实社会;三是供养人画像中出现了表现贵族生活的场景;四是新出图像比较多。第290窟开凿年代在563~564年,又明显具有王公窟特点,而此时任瓜州刺史者正是河西公李贤。因此,第290窟窟主就是李贤,窟内壁画及塑像均为北周保定三年所绘制。敦煌李姓早于北周时期李贤因官才寓家于敦煌,所以,河西公李贤是敦煌李姓的一人。李贤于北周保定三年在莫高

窟修功德窟,即今莫高窟第290窟。窟内绘塑均为保定三年所绘制,窟内所绘供养人画像表现的就是李贤亲族及其官衙僚属的真实写照。供养人身份可以分为功德主,即李贤以及李贤亲族,此外还有当时北周敦煌地区的高僧集团以及李贤生前的官衙僚属。

自北周李贤、李穆因官寓家于敦煌之后,敦煌李氏在敦煌的地位开始巩固起来。其子孙隋唐时仍有居家并居官敦煌的。后来,在隋炀帝大业时,这个“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的“西京盛族”遭隋炀帝诬陷,制造了李门冤案,除被杀者外,余者被迁于岭外。唐高祖武德时,赦还其存者,再派其到敦煌居官。这就是《圣历碑》所记“曾祖达,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反映的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李达因家敦煌,这也是李姓世族第三次迁居敦煌任官。自“敦煌司马”李达任官敦煌之后,李氏后代人丁兴旺、官运亨通,在敦煌的社会政治、佛教事务中担当重要地位。圣历元年(698),李达在莫高窟出资营建第331窟;后来,李达次子李克(怀)让营建第332窟;盛唐时期,李大宾在莫高窟营建第148窟。

李氏家族的势力在895年底达到极盛,896年,“倒李扶张”政变之后,张承奉重新掌握归义军政权,杀了李氏三兄弟,李氏家族势力由盛转衰,只有李明振次子李弘定在瓜州任职,大概因远离沙州,其后裔才得以延续下来,并在曹氏归义军政权中担当要职。^⑤此后,敦煌李氏世族势力逐渐减弱,在莫高窟再没有开家窟。

[注 释]

《周书》卷5下列传42《异域传上》。

《周书》卷50列传42《异域传下·吐谷浑传》。

《周书》卷50列传42《异域传下》之《高昌传》、《粟特传》、《波斯传》。

《周书》卷50列传42《异域传下》之《百济传》、《安息传》。

施萍婷主撰稿、苔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60页。

⑫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学习集》(下),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528页。

《北史》卷67列传55《段永传》。

李崇峰:《有关莫高窟北周洞窟研究的两个问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之《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6~88页。

⑪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60页。

⑬《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

⑭《周书》卷30列传22《于翼传》。

⑮《周书》卷25列传17《李贤传》。

⑯《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

⑰李贤墓志拓片资料参见罗丰:《李贤夫妇墓志考略》,《美术研究》,1985年第4期。

⑱《周书》卷15列传7《于谨传附子寔传》。

⑲《隋书》卷39列传4《于义传》。

⑳《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附子询传》、《李贤传附子崇传》。

㉑《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附弟远传》、《李贤传附弟穆传》。

㉒《北史》卷59列传47《李贤传附弟基传》。

㉓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㉔孙修身:《伯3718“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㉕张书城:《新唐书陇西李氏敦煌房辨疑》,《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

㉖《周书》卷25列传17《李贤传》。

㉗小野玄妙:《敦煌的艺术和佛教》,《现代佛学》1卷7号—2卷12号,1924年11月—1925年4月;又刊于《小野玄妙佛教艺术著作集》(1~10),开明书院1977年版。

㉘向达:《西征小记》,《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1页。

㉙常书鸿:《敦煌彩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

㉚福山敏男:《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建筑史研究》,1952年第7号。

㉛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㉜李崇峰:《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敦煌研究文集·石窟考古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11页。

㉝赵青兰:《莫高窟中心塔柱窟的分期研究》,“纪念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研究文集·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56页。

㉞见敦煌文书P.2762《张淮深碑》。

㉟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㊱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10页。